

总 述

总 述

—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东南和大庆市接壤，西北与齐齐哈尔市为邻。南北平均长 102.9 公里，东西平均宽 60 公里，总面积 6 176 平方公里，合 926.4 万亩。滨洲铁路和庆西公路分别在县北部和中部穿越。

进入杜尔伯特，平野漫漫，一望无际。汇合万泉、奔泻千里的嫩江到这里放慢脚步，舒展开身体，款款南去；温柔而娴静的乌裕尔河姗姗北来，化作一个又一个湖泊，繁星一样撒遍草原。嫩江流经 146.7 公里，乌裕尔河形成大小湖泊 58 个。“五草二水二分田，城镇村林路，只在一分间”，抽象地道出了杜尔伯特的地形地貌。总面积中，草原 466.6 万亩，占 50.4%；水面（包括苇塘）173.1 万亩，占 18.7%；耕地 195.9 万亩，占 21.1%；其他 90.8 万亩，占 9.8%。

广袤的草原和辽阔的水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息繁衍的场所。县境内有鹤、鳧、雁、鹭、鸕、雉、鹇、莺等鸟类 149 种，鲑、鲤、草、鲢、鲂、鮑、鳊、鳙、鲢等鱼类 51 种，狐、貉、獾、狍、黄羊、草兔等兽类 23 种，芦、蒲、茨、菱等水生植物 57 种，山杏、欧李、桑、柳、黄芪、苜蓿、羊草、萱草、百合、防风、甘草等陆生植物 300 种。除动植物资源外，地面上还分布着丰富的碱、盐、硝、砂等矿物资源。以上种种资源，以草、苇、药、碱、鱼最为突出，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好。草指羊草，年产干草 4 万吨左右，数千吨销往县外和出口国外；芦苇年产 10 万吨左右，绝大部分运销东北各大造纸厂；药主指防风，年产 100—400 吨，运销县内外及出口国外；土碱最高年产量上千吨，行销县内外；鱼类年自然捕捞量 2 500 吨左右，大部分销往大庆市。县北部 70 余万亩苇塘，属于扎龙国家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丹顶鹤那绛冠巧小、素羽蓬松的情影经常出没于密芦环绕、萍菱点点的湖心。县中部乌胡马尔芒罕野生药材自然保护区，是饮誉东南亚的小蒿子防风出产地。这里既有芳花迷离、草树点缀的丘谷，又有青翠连天、牧草丰盛的原野，还有郁郁葱葱成片人工林。县西部连环湖国际水禽狩猎区，湖泊密集，波光粼粼，到此可以观赏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江南般的景致。每逢春、秋两季，随着鳧、雁迁徙，金发碧眼的国外游客纷至沓来，添加许多异国的情调。湖泊草原之下，千米深处，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宝贵的乌金，正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和利用。

二

陶鬲骨刀、辽砖金瓦……索离人、豆莫娄人、涅刺拿古人、契丹人、女真人先后掠

过这座历史舞台，留下班班遗迹。最后，蒙古人游牧到此，并且定牧下来。《蒙古秘史》记载：“朵奔篾儿干（成吉思汗十一世祖）的哥哥都蛙锁豁儿有四子，同往中间，都蛙锁豁儿死了，他的四个孩子将叔叔朵奔篾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他，自分离去了，做了朵儿边姓。”朵儿边即杜尔伯特，蒙古语“四”之意。十世纪，杜尔伯特部游牧于呼贝尔，十三世纪初，移牧到嫩江与通肯河之间。清顺治五年（1648），杜尔特部建为杜尔伯特旗。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杜尔伯特旗，设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蒙古族是这里的土著民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驿站建成，汉族站丁移入。清光绪三十年（1904），“蒙旗地开放”，汉人大量涌入，回族等少数民族随之而来。清廷的封禁政策，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民国、伪满期间，又产生许多新的民族矛盾。1946年，人民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奠定了民族间平等和谐的关系。1956年，国家赋予本县以自治的权力，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协作，互相尊重，友好相处。1985年，县内有蒙古、汉、回、朝鲜、达斡尔、满、壮、黎、白、锡伯、鄂温克、柯尔克孜等12个民族，总户数4.8万户，总人口22.3万人。其中蒙古族3.3万人，占14.91%；汉族18.6万人，占83.75%；其他民族3005人，占1.34%。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丰富而多采，蒙古族的风俗自有其独特之处。“那达慕”上，可以尽情饱览骑手们风姿的雄健或飒爽；草原宫中，可以聆听马头琴音韵的浑厚和深沉；牧民家中，甜滋滋的奶茶，香喷喷的手扒肉，洁白的哈达，热诚地欢迎和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如逢婚礼喜庆，酒酣兴浓，“祝酒歌”、“安代舞”交相迭起，歌也豪放，舞也洒脱，情也真切，意也绵长，使人不醉亦醉，留连忘返。

三

蒙古族早期以游牧生活为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当时自然景观的写照。清代，驿站建成，站丁在驿站范围内开垦小片庄田。随着驿站的出现，商业、手工业陆续产生。“蒙旗地开放”后，大面积牧场变成庄田，人口剧增，发生了以牧业为主向以种植业为主的转换，工商业获得发展的契机。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实行“经济统制”，农民运用原始的工具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所收获的农产品或“出荷”殆尽，或被盘剥一空；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或无力购买，或在“配给”过程中被层层截留。麻袋片作衣、糠菜当粮、草把子为枕的农户比比皆是。然而，伪满官吏终日鲜衣美食，警察特务出入妓院烟馆，却有淫乐无穷。

1946年，中国共产党把全旗各族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947年，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1948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9年后，旗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国营、集体工商业，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引进先进技术、优良品种、新式农具和机械化农具，并从贷款上给予扶持。1953年，国民经济纳入计划经济运行轨道。1956年，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治比较民主，经济目标比较实际，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人民群众献计献策，勤奋苦干；农业连年丰收，工商业产值或营业额成番论倍增长，许多家庭生活

达到温饱；社会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精神蔚然成风。1958年“大跃进”期间，真话、实话遭到排斥、禁锢，假话、空话泛滥成灾。盲目冒进、脱离实际地追求高指标，一轰而起开办了众多的工厂、农场和公共食堂，开展了深翻地、大炼钢铁等运动。在这轰轰烈烈的背后，掩盖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减弱，热情消退。1961年后，根据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委、县人委着手调整产业结构，关、停、并、转了数十家工厂，增大农业投资比重，划小农村核算单位，恢复、建立各种奖惩制度并予以兑现等。两三年间，农业生产重新起步，走出低谷；工业生产状况好转，扭亏为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法制遭践踏，党风、民风受破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砸烂”，“大帮轰”、“大锅饭”式的劳动分配制度主宰着各行各业，管理混乱、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存在。国营企业亏损、农村社队“三靠”（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口粮靠返销）成了通病。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杜尔伯特，到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县委、县政府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改革了农村、城市、工商、物价、财政、金融、计划、基本建设等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了产业结构，制订了“以牧为主”的发展方针。尤其是1980年，县委、县政府参照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显著效益。到1981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自给有余，一举结束连续18年吃返销粮的历史。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步进行。国营工商企业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陆续扭亏为盈或减亏增盈；集体、私人（个体）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农民家庭纷纷脱贫致富，职工家庭生活普遍好起来，社会风气也焕然一新。同时，党和国家给予本县以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实行预算固定补助、“三项民贸”补助、牧业现代化投资等。1985年，农业形成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格局；工业形成以轻纺为主、向石化等新领域开拓的格局。家庭农场、渔场、林场及各类专业户遍地开花，一条条工业生产线建成投产，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城镇建设初具规模……。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9776万元，工业总产值4922万元，商品零售额9239万元，财政收入2118.8万元，人均收入495元。全县粮豆薯总产9万吨，每亩单产240斤。大牲畜存栏8.6万头（匹），羊存栏6万只，产出商品鱼7018吨。国营、集体工厂67家，私人手工业167家，主要工厂有乳品、毛线、造纸、制酒、制油、制米、砖瓦、农机、毛毯厂等。公路总长383.3公里，桥梁26座，客车83台，货车235台，特种车16台。邮电局所14处，邮路总长262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800门。35千伏输电线路总长183.1公里，年供量2376万度，79.7%的自然屯通电。国营、集体商店（门市部、公司）718家，私人商店（铺、摊床）1111家，贸易市场7处。基本建设投资3181万元，完成房屋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等等。

四

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长期的游牧生活和频繁的战事，孕育出蒙古族三项竞技（赛马、摔跤、射箭）、三项游艺（踢牛膝骨、抛曲棍、踢高球），融体育、娱乐、贸易于一体的“那达慕”盛会随之诞生。喇嘛教的传人，使蒙

古族的教育、医疗都蒙上宗教的色彩，产生世代相传的喇嘛教师、喇嘛医。萨满乌斯楞（跳鬼）——是一种即属于宗教祭祀又属于文化娱乐的活动。驿站建成，站丁从流放到黑龙江的南方文人中聘请塾师授课。“蒙旗地开放”后，私学馆、官学堂陆续兴办，中医、西医相续传入。民国、伪满时期，封建官僚的统治，帝国主义的压迫，全旗 12 岁以上人口中 95% 的人是文盲，假若有人识上一二千字，就会被捧为“圣人”，最可怜的是，许多村屯连这样“圣人”都没有。人们患病，多向神、佛求救，常常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妇女、儿童的境遇更加悲惨，“妇女产前后如过鬼门关”、“但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等歌谣，诵者伤心，闻者震颤。

1946 年解放后，旗政府着手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等事业，中学、医院、剧团、书店、文化馆、广播站、电影队陆续设立；扫盲教育、科技活动、新法接生、体育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蓬勃开展。蒙古族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受到旗（县）政府的特别重视，成立蒙医诊所，开设蒙古族小学，组建蒙古歌舞团……。人们的文化水平、健康水平普遍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贬值，青少年学业荒废；“那达慕”大会停办，其他体育活动也大大减少。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投资。蒙古族中学、妇幼保健站、文化馆、体育馆、电视转播台等 10 余座楼、塔相继落成；学龄前教育、电大教育、成年人教育、文物考古、电视转播等项事业陆续兴办。1985 年，教育出现多层次办学的喜人现象；防疫治病在积极引进高、精、尖技术的同时继承和完善民族传统医疗技术；体育运动更加大众化、规范化。全县有大（电大）中、小学校 328 所，教职员工 2911 人，中学在校生 1.3 万人，小学在校学生 3.3 万人，儿童入学率 97.5%；医院（站、所）39 处，医疗点 144 处，医疗人员 608 人；科技人员 2504 人，受市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 132 项；文化馆、团、队、店 49 个，图书发行 101.7 万册；县级体育场、馆 3 处，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 78 人；广播发射塔、电视转播塔 4 座，电视机 900 余台。

五

长期的游牧生活和频繁战争，也造就了杜尔伯特蒙古人善于骑射、勇于冲击的特长。清代，在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和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争中，杜尔伯特蒙古兵充分发挥本身特长，建功累累。杜尔伯特汉族人有着同样的壮举，爱国志士王宾章就是从这里启程，走上反满抗日的战场。1946 年，中国共产党进入杜尔伯特，末代札萨克色旺多尔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赞成革命。蒙古族、汉族人民组成蒙汉联军，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剿灭了土匪，平定了地主武装叛乱，巩固了人民政权。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有近 3000 名热血青年志愿参军，走上战场，其中有 200 余名英勇牺牲。为国捐躯。身居后方的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晒干菜、做军鞋，捐献粮草和现金，以及出动担架队和收治伤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上百名国家级、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建功立业，为县争光。勤政爱民的好县长陈有宝和舍己救人的王福华、王福红姐妹等等在杜尔伯特人民心目中矗立起永远的骄傲！

六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南接大庆北连齐齐哈尔市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数十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革命传统等构成杜尔伯特持续发展的优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为杜尔伯特创造了持续发展的最佳机遇；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和照顾赋予杜尔伯特持续发展的特殊条件；穷则思变、振兴家乡的群体意识恰恰是杜尔伯特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杜尔伯特也有其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一是过度地开发和利用而又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草原、苇塘大面积退化，个别兽类、鱼类、爬行类和植物种类绝迹或濒于绝迹；二是产业结构失衡，工业规模小、效益低，乡镇企业严重短腿，农业经营粗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三是人才缺乏，急需一批行业、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中心是个才字。驾驶科技靠人才，管理经济靠人才，执掌法律靠人才，培育人才更要靠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任用、选拔、竞争机制，包括改革政治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发扬民主，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增加教育投资比重和提高教学质量等，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成为能创造巨额社会财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源。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瞻望前景，信心百倍。未来的杜尔伯特，必将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杜尔伯特，必将是一个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才济济的杜尔伯特！

1949—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

金额单位 万元

年 份	金 额	年 份	金 额	年 份	金 额
1949	1 025.9	1962	1 957.8	1975	5 843.6
1950	1 224.6	1963	2 215.6	1976	6 582.8
1951	1 355.1	1964	2 424.4	1977	6 430
1952	1 647.3	1965	2 268.8	1978	6 759.3
1953	1 879.6	1966	2 807	1979	6 208.4
1954	1 824.5	1967	2 608.1	1980	8 255.3
1955	1 684.1	1968	2 174.6	1981	6 171.9
1956	2 100.6	1969	2 398.1	1982	9 536
1957	2 044.9	1970	3 358.4	1983	12 573.6
1958	2 952	1971	4 317.8	1984	13 318.7
1959	3 276.9	1972	4 739	1985	14 748
1960	3 638.9	1973	4 842.6		
1961	2 236.7	1974	5 082.7		

1980—1985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消费、积累表

金额单位 万元

人均国民收入金额单位 元

指 标 \ 年 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社会总产值	11 542		12 577	16 185	19 128	22 720
国民收入总额	6 286		6 285	8 152	10 663	10 988
人均国民收入	285		286	369	482	495
消 费	5 733		5 347	6 632	7 506	9 760
积 累	1 608		1 485	3 419	3 793	4 404

大事记略

大事记略

一 建旗设治

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顺治帝封杜尔伯特部镇国公色楞为札萨克固山贝子。杜尔伯特部建为杜尔伯特旗，隶属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

清廷规定，旗设札萨克 1 人，协理 2—4 人，管旗章京 1 人，副管旗章京 1—2 人。下设参领、佐领、骁骑校。每 6 佐领上置 1 参领，每 100—250 壮丁上置 1 佐领，每佐领下置 1 骁骑校。

札萨克由朝廷敕任并支給俸禄，世代承袭。协理、管旗章京由札萨克在台吉（贵族）中选拔，奏请理藩院批准。副管旗章京以下，直接由札萨克任命，报哲里木盟备案。

札萨克执掌一旗之政，旗域内土地属札萨克封地，有直接或间接支配权，但不允许对旗外出售、转让和租赁。札萨克有私人军队，只用于旗内治安，军事行动必须听命于清廷，清廷有权调动各旗军队。札萨克有批捕、审判权，除死刑须奏请理藩院外，其余刑罚自行决定。旗内的财政或财务收支、贡献、捐税等也由札萨克自行规定。协理辅佐札萨克执政，通过建议、策划帮助札萨克制订法令、制度、措施等。管旗章京是旗的最高行政、军事官员，具体贯彻执行札萨克的命令或指挥、监督参领以下贯彻执行札萨克的命令。参领负责某一区域的行政事务，主要是掌管户口、壮丁。佐领协助参领负责户口、壮丁的登记注册。骁骑校负责征兵或率兵出征。

清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清帝退位。退位优待条件中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一条，第三款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出于笼络蒙古旗王公的目的，对蒙古王公普遍晋爵，旗萨克固山贝子希拉布罗丕勒晋爵为多罗贝勒。民国二年，管旗章京镇国公乌尔图那苏图晋爵为固山贝子。伪满康德元年（1934）3 月，杜尔伯特旗札萨克府改设旗公署，旗札萨克多罗贝勒色旺多尔济废爵改任旗长。撤销协理、章京、参领、佐领等，设立秘书官、总务科、内务科、警务科。

二 驿站开设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康熙帝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兵 1 500 人进驻黑龙江城（即瑗瑛旧城，今苏联境内维笑勒依村），准备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今苏联阿尔巴津勒颜镇）。十月，户部奏议，黑龙江和乌喇（吉林市）之间，须设 10 个驿站，由于没进行勘测，很难确定设驿地点，等待来年三月冰雪消融，在户部、兵部、理藩院中各选派 1 人，并由宁古塔将军在郭尔罗斯前、后旗和杜尔伯特旗找两名向导详细丈量。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命令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立即出发前往黑龙江办理设驿一事。清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丈量完毕，驿路总长 1 195 里，拟设驿站

14 处。康熙帝认为通过驿站传递军情至关紧要，应用细尺丈量。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征雅克萨城，康熙帝命令理藩院侍郎明爱从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选兵丁 500 人和索伦兵一起，在墨尔根（今嫩江县城）和雅克萨城之间，设临时驿站传递军事情报。五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克雅克萨城，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兵丁返旗。同月，包奇奏明皇帝，经重新丈量，驿路总长 1345 里，应设 19 个驿站。七月，康熙帝批准开建驿站。清康熙二十五年四月，驿站建成，归黑龙江将军管辖。杜尔伯特旗境内设温特河、多耐、他拉哈 3 站。温特河站北至特穆德黑站 75 里，温特河站南至多耐站 75 里，多耐站南至他拉哈站 75 里，他拉哈站南至古鲁站 67 里，古鲁站南至茂兴站 100 里。在茂兴站设总拨什库（领催）1 人，分管以上各站。每个驿站置站丁 30 人，从中选任拨什库 1 人。牛、马、车的数量大致按站丁数额配置，每站马 20 匹，牛 30 头，车 30 辆。马用于传递公文、情报，车用于接送官员、军需。站丁原是云南藩王吴三桂部下，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将他们发配到黑龙江充当站丁。站丁在指定的方园十二里区域内从事饲养牛、马、传递公文等公务，平时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不承担租税，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况下，可无偿使用驿站牛、马、车辆。每年春季，黑龙江将军衙门一次性支付各种费用。每匹马月支草豆银 1 两 5 钱，每头牛月支草豆银 1 两。按牛、马数额 30% 核支倒毙牛、马价银，每马价银 9 两，每牛价银 7 两，每辆车每年支修车银 5 钱。如遇公文到站，例由拨什库轮流派站丁传递，一般公文送到下一站后，换马换人；遇有紧急文书，到站换马不换人，疾驰几站再换人；偶有火急军情或皇帝命令，必须星夜疾驰，人马都不换，站上俗称“八百里滚蛋”。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每站设笔贴式（站上称千爷）1 人，取代拨什库。清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下诏抚恤站丁，每人每月发津贴京钱 1 千文，后改为银 1 两。清光绪十九年（1893），清军总兵聂士成北巡考察时所见驿站情况是每站置笔贴式 1 人，委员 1 人，书记 2 人，头目 2 人，站丁 23 人；马 27 匹，牛 27 头。清光绪三十二年，中东铁路已全线运营，电话线路开始架设。与铁路、电话相比，“驿递疲缓，文报稽迟”。闰四月，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皇帝：“茂兴至黑龙江城各站，俟俄约定后，妥订章程，仿照俄站办理。其呼兰各台，酌量裁撤，各站站丁改归民籍，并设文报以代驿递”。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皇帝批准，裁撤驿站，改设文报局，站丁改归民籍。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驿站及站丁划归武兴设治公所管辖，并开始征收站丁地税。

三 蒙旗地开放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黑龙江将军恩泽派人到杜尔伯特旗劝说开放荒地。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启奏皇帝开放蒙古各旗荒地。同年，恩泽详细地向皇帝奏明杜尔伯特等旗地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开放的步骤、办法。恩泽认为：“自到任以来，即详查本省属内之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后旗等蒙古部落，地面辽阔，土脉膏腴，可垦之田实多。虽该旗均以游牧为生，而近年牧不蕃息，蔓草平原，一望靡际，闲置殊觉可惜。况值新修铁路自西往东直贯该三旗之地，他日横出旁溢，未必不有侵占之虞，论慎固封守之义，亦应先事预防。”又“若照寻常荒价加倍订拟，以一半归之

蒙古，即可救其艰窘；以一半归之国家，复可益我度支。”清光绪三十年八月，清廷批准出放杜尔伯特旗荒地，设立杜尔伯特旗荒务行局，委派协领依拉尔苏任荒务行局总理。

第一次开放安林地段

清光绪三十一年初，黑龙江将军达桂派道员同铁路公司交涉，收回铁路以北的土地，并且与旗札萨克达成协议，正式勘察出放旗铁路两侧荒地和旗、省边界荒地（在今大庆市、安达市、林甸县境内）。承领土地人多是省内外富商、地主等，他们付清荒价银后，便获得土地永租权或者说所有权，然后，再将土地转租给源源不断涌入的关内外汉族贫民和外旗蒙古族人。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出放完毕。在铁路两侧，出放荒地 20.85 万垧，并且查出熟地 1 091 垧。在旗、省边界出放荒地 12.2 万垧，并且查出熟地 1 006 垧。所放荒地，因含有盐碱地、沙丘、道路等，实以七折核价，每垧收银 1 两 4 钱，共收入白银 32.3 万两。荒地从第六年升科起租，熟地当年起租，每垧征收大租 660 文（制钱），小租 60 文（制钱）铁路两侧荒价收入白银 20.4 万两，清廷与旗对半分，旗所分部分称为蒙租，共分得白银 10.2 万两。按清廷规定，蒙租收入 4 成归札萨克，3 成 5 归努图克，2 成 5 归寺庙。实际上，旗札萨克并没有照此执行。旗、省边界荒价收入白银 11.9 万两，全归清廷，旗对此提出疑议，始终未获解决。熟地大租收入 660 文中，440 文归旗，220 文归清廷；小租收入 60 文中，40 文归省，20 文归旗，旗以此抵交经征费。同年，设立安达厅，杜尔伯特旗铁路以北土地和铁路以南开放地全部划归安达厅管辖。民国 2 年（1913）安达厅改为安达县。民国 3 年，在安达县辖区内增设林甸设治局。

在出放荒地的同时，为蒙古族人保留一定的荒地做为“生计地”。保留标准：台吉每人 2 方里，壮丁、喇嘛、孀妇每人各 1 方里。

第二次开放时和年丰地段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与札萨克达成协议，出放沿江一带荒地（在今泰来县时雨村、本县泰和村和他拉哈镇、肇源县富强乡境内），省派人前往勘察筹备出放。九月，设立杜尔伯特旗沿江荒务局，委派骑都尉庆恩（寿山之子）为荒务局总理。荒务局人员刚刚进入多耐站（今泰和村），“马匪”天合队伍随之攻入多耐站，将荒务人员全部虏为人质。当时，庆恩正在旗札萨克府商讨开放事宜，闻讯后，单人匹马找到天合谈判，天合释放所有人质，并且撤出多耐站。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撤销沿江荒务行局，成立武兴设治公所，委派绥化府经历锡寿为设治员，驻多耐站，继续出放荒地和管理行政事务。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共出放毛荒 5.64 万垧，仍按七折核价。上等地每垧白银 5 两 1 钱，中等地每垧白银 2 两 4 钱，下等地每垧 1 两 4 钱。另按荒价的 15% 收取经征费。应收荒价白银 12.07 万两，实际收入 3.83 万两，承领土地人欠 8.24 万两；应收经征费白银 1.66 万两，实际收入 4 200 两，承领人欠 1.23 万两。在垦区内查出熟地 600 余垧，多是站丁早期开垦的耕地，当年起租。

武兴设公所放荒地较少，即使已出放的土地多数也未开垦耕种。又清光绪三十四年，江水暴涨，准备出放的荒地大部分被洪水淹没，不再有人承领土地，武兴设治公所无所事事。清宣统元年（1909）下半年，撤销武兴设治公所，将其事务划归江西哈拉火烧屯垦局办理。民国 2 年（1913），泰来设治局成立，时、和、年、丰四段垦区划归泰来设治局管辖。

第三次开放丰字续段

民国 4 年，泰来设治员张毓华在事先没同旗札萨克协商的情况下，在丰字南段和丰字北段分别续放 1 段荒地（在今一心乡、大庆市兴隆泉乡境内）。民国 5 年，旗札萨克与张毓华发生争执。民国 6 年，经省调解，达成协议，将此两段荒地正式出放，共放荒地 9.7 万垧。

第四次开放民康物阜地段

民国 14 年，旗札萨克请求省公署派人清理丈量时、和、年、丰四段垦区，以消除虚报冒领的混乱状态。7 月，省在多耐站设荒务办事处，委派马汝邨（后改名马百年）为专员，着手清理丈量工作。马汝邨在清理丈量时、和、年、丰四段垦区同时，又开辟了民、康、物、阜四段垦区（在今克尔台乡、泰康镇、一心乡、白音诺勒乡、敖林西伯乡境内）。由于事先未和旗札萨克协商，旗札萨克提出抗议，致函省公署状告马汝邨。省公署答复：“这次开放的土地均由本省职员及各厅科长承领，并非向民间出放。他们办理荒务多年，有很多功劳，而贵旗土地广阔置于荒废实在可惜，因此，乞予同意。”旗札萨克不得已表示同意出放此四段荒地。土地价格屯基、熟地每垧 3 元 6 角（江洋），荒地每垧 2 元 4 角，荒地仍以七折核价。按规定，地价收入省、旗对半分成，实际上，旗未得一分一厘，旗札萨克再次提出抗议。为此，省以借款形式拨给旗 6 万元（大洋）此款将在旗的荒价分成中逐渐扣回。民国 15 年，民、康、物、阜四段垦区共出放土地 14.4 万垧。民国 16 年 5 月，泰康设治局成立，马汝邨任设治员。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 15 年（1926），共出放荒地和熟地 86.23 万垧。旗荒价分成（蒙租）收入白银 32 万两，大洋 6 万元。

四 泰康设治

民国 14 年（1925）7 月，黑龙江省长公署委派马汝邨为杜尔伯特旗荒务处专员，清理时、和、年、丰四段垦区。民国 15 年初，马汝邨呈请在此四段垦区基础上设立行政区：“各该段位置在嫩江之东，自出放以后，虽已开熟地不少，而民国三年泰来县成立，县城设于江西泰来乞地方。遂与各段距离过远。中复阻隔大江，往来均须绕道哈尔滨，泰来对于各段行政由是有鞭长莫及之势头。后奉江大道改移，官商往来多由县城直达洮南，江东民渐至裹足，事业愈形凋敝。民国七八年间，胡匪利用各该段官力不及，连肆劫掠，于是稍有身家者相率弃地他去，全境几空。且查各该段幅员虽不甚大，而边线则最长，毗连龙江、景星、林甸、安达、泰来、大赉、肇州、肇东等八县（局）。境内民户既少，警团自然力单，匪等遂特为逋逃之藪，每每盘踞其中，无人过问，不但为害各段，亦且祸及邻邑。现查各段民户，从前已至万家，今所存不过千户。应行升科之地七八万垧，今则继续耕种之熟地仅一万数千垧。似此情形，虽因匪扰，其实官力不及有以致之。专员到段前，招集原户，飭令呈验大照，以备拨地，而到段者甚为寥寥，其到段者又每以能否设治为彼等开垦之标准。杜旗王公等在段时屡以该地出放二十年，租赋无着，情愿展放若干，俾足设治局面。”同年，马汝邨开辟出放了民、康、物、阜四段和时字东段（今九合村一带）垦区，并且选定设治局建城地址。城址原定位于丰字北段中间的达什吐西南 30 里处，后又选定在位于康字二十二井（今贝子府屯）。民国 16 年 3 月 19 日，黑龙

江省长公署就在泰来东境添置泰康设治局一事，咨请东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即于旧有之时、和、年、丰暨新展之民、康、物、阜等八段设立泰康设治局，委任马汝邠为设治员，以顺舆情、而兴地面。泰康设治局全境地属杜尔伯特旗，时字西段（今时雨泡之西、四方山之北地段）系属省界，未便附入，应划归龙江县管辖，以免征收租赋时有所混淆。中东铁路迤西，原属林甸县各地，与泰康设治局毗连，应即将铁路迤西各地暨小蒿子车站划归泰康设治局治理，即以铁道为界，易于遵守”。3月22日，黑龙江省吴俊陞签署泰康设治训令。5月3日，省警务处发布泰康设治局开办日期指令：“定于本年五月一日为该局实行开办日期，暂假小蒿子清理时、和、年、丰四段荒务处办公。”11月15日，黑龙江省长吴俊陞签署训令：“查泰康设治一案，原定将林甸县属之小蒿子车站及铁路迤西之镐丰镇、下大洼子、新台子等处全行划归该设治局管辖。嗣因如此划拨种种困难，复经本署详加考察，小蒿子车站实为林甸往来门户，地方收入多由该站征收，一旦划出，地方支出无从维持，应将该车站仍归林甸管辖。但泰康全县如无车站以为出入门户，于地方发达上亦有妨碍。查安达县属之喇嘛甸子一站正与泰康之丰字东段毗连，距该局设治地点亦较近，将该站及该站铁路迤西之姜家窝堡、张家窝堡、新安堡、宽厂子及曲家窝堡路西这一段均划归该泰康设治局管界。”民国18年2月14日，黑龙江省长公署指令财政厅，重新将林甸县铁路迤西各地一并划拨给泰康设治局。

伪满大同2年（1933）4月，杜尔伯特札萨克色旺多尔济呈请兴安总省公署，提出裁撤泰康设治局，将其辖区并入杜尔伯特旗。伪满民政部根据兴安总省公署呈报，批转黑龙江省公署核办。5月5日，黑龙江公署呈报：“为准兴安总省函开杜旗拟将泰康设治局裁撤，仍旧该旗统治请核办一案，因与本省放荒设治章程不合，实难照准。”12月，泰康设治局改为泰康县。伪满康德7年（1940）5月，仍然根据色旺多尔济的呈请，经伪满民政部批准，撤销泰康县，将其辖区并入杜尔伯特旗。

五 泰康设治员交接案

民国17年（1928）12月31日，泰康设治员马百年调省，杨孝则接任。民国18年3月，黑龙江省政府派林甸县县长张锦禄为监盘官，监督交接。在交接中发现马百年擅自挪用工程费、公益捐、实业费共计246.5万吊（江钱、合大洋28700元）用以支垫蒙旗交际费、警费、学费等。省政府给予马百年记过一次，扣罚月俸十分之一的处分，并责令其设法弥补所挪用的款项。马百年在设治员任上曾赊放大量荒地，虽经催要，承领人一时难以偿还价款，决定南下找亲友借贷。9月，在取得商号担保和以私人地照为抵押品的情况下，省民政厅才允许马百年外出。马百年在青岛借贷9000元（大洋）上缴后，又转赴南京筹款，病死南京，尾欠款仍有19700元（大洋）之多。省政府一方面将担保人扣押，一方面督促其弟马汝邵务必在3个月内筹足款额。马汝邵决定将其兄马百年所有的龙江县兴壤乡由义社田庄变卖及收取佃户粗粮抵交欠款。田庄共有塾地187垧5亩，荒地226垧5亩，以及房、井、磨、围墙、炮台等。民国19年2月，田庄未能卖出，粗粮也仅收上33石6斗。马汝邵呈请省财政厅厅长：“诩意先兄病逝南京，上有老母，下遗孀妻，孤女有二，养育需人，官逋未补，私债山积。虽云措置之未善，实因公而亏累。”又“伏乞钧长大发仁慈，俯念先兄因公亏累，病歿遐方，身后萧条，家境艰窘，恩施格

外，准以熟地窝堡归官拍卖，并以交际蒙人费用核销，尾欠俾免补解，则生者感激莫名而歿者亦得瞑目矣。”3月26日，省政府主席万福麟根据马汝邵的请求，将马百年的田庄及所收租粮作价12900元（哈洋）拨给官办博济工厂，对尾欠4200元（哈洋）予以豁免。

伪满大同元年（1932）3月26日，原泰康设治员杨孝则免职后未待交接即以治病为由先期离任，委托财务科长王锡锐代办交接手续。4月1日，新任署理泰康设治员张孝友到职，黑龙江省公署派署理林甸县县长王树章为监盘官监督交接。4月15日，枪弹、文件等已交接清楚，只有应交钱款分文未交。从帐目中查出应交款共6000余元（大洋），其中，侵占地方枪款及亏欠学费、房租等3000余元，应交给下任设治员和上解省的禁烟费、保甲费、城基公益捐、审判费等3000余元。在交接期间，张孝友风闻王锡锐企图溜走，就请王锡锐到局署办公，实则将其软禁。经农会会长李行泰、富绅彭伯衡出面作保，才允许其回家。又征税人员上交税款290万吊（江钱），张孝友全部查收截留。此时，杨孝则已在伪新京（长春）找到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就任司法部秘书官，又给王锡锐谋得司法部编辑科科长一职。王锡锐收到杨孝则来信后，先派其妻黄玉贤潜往新京，后于4月26日逃走。张孝友闻讯，立即对王家进行搜查，将正在王家作客的王锡锐亲属黄海楼、赵玉璞（女）和设治局书记员商喜春扣押，并且派李行泰到长春打探杨孝则、王锡锐下落。5月2日，张孝友将杨孝则先期离任、应交款未交、王锡锐潜逃等事呈报黑龙江省财政厅。5月3日，杨孝则从新京五马路赵院住址至函财政厅，控告张孝友“诛求甚苛，所收之款悉数劫扣，应解各款勒交私存，王科长被匪架去，竟将员书及亲属一律看押。”又“伊以交卸者为不可靠，然则接事者扣款不解，宁无异志耶？”同日，伪造李行泰、彭伯衡、黄玉贤、赵玉璞、商喜春等7人联名控告信一封，寄给省长程志远，信的内容与前信大致相同。5月12日，程志远签署训令，批转财政厅的呈件，令杨孝则立即返泰交接，又令张孝友释放人质。5月14日，杨孝则复函财政厅厅长，告知他已在新京就任司法部秘书官“任重事繁不能随便请假即另派受员带款赴泰代为负责。”又说有6个月经费未领，民间所欠还有8000余元（大洋）与应交款相抵并不亏欠。5月19日，民政厅派冯世琪会同王树章调查杨孝则是否亏欠钱款。同日，张孝友呈请程志远：职前任杨孝则与承办交代之科长王锡锐均先后潜逃长春供职司法部，对于交待具不办、又不理，大有认为钧府亦无可如何之处。”又“对于公私款项，财厅所存之经费全扣亦不敷抵，民厅派员彻查，不知如何令前任偿还也。”经冯世琪、王树章调查，杨孝则欠款属实。5月31日，财政厅令张孝友将所收税款290万吊如数上解，立即释放所扣押的人质。对杨孝则“本应依例惩办，姑念该员即已派人携款前往负责交待，从宽免究。”6月9日，杨孝则致函财政厅，说他虽然亏欠应上解款项2000多元（大洋），但是本人通过挪借垫付的警费、学费高达1万余元。现在“债积如山，筋疲力尽，实无法再措现款。”6月11日，王树章呈报财政厅，说明交接事情原委，为张孝友扣款、押人两事辩解。6月14日，杨孝则的代理人李春池到泰康，以各项钱款未经手，不知如何办理为由，拖延时间。7月9日，张孝友奉命调任署理林甸县县长，呈请财政厅将杨孝则亏欠钱款一事移交新任设治员陶景明处理。7月24日，财政厅长下令：“该杨前设治员委派素不经手之人负责交代固属不合。而张设治员即知杨任所派交代员诸多未谙不即按实揭报，任令稽延，尤属非是，

均应申斥！现在张设治员即已奉令交卸，所有接收杨任未清各款，应委派熟悉交代情形人员会同新任陶设治员继续清理以资送结。”

六 中共地方党组织及人民政权建立

1、旗、县分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5日伪杜尔伯特旗公署解散，旗长色旺多尔济联合旗公署官吏傅振绪、邵桂香等人组成解放委员会。不久，解放委员会又改称地方治安维持会，傅振绪任会长，邵桂香任副会长。11月，冠布仁钦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到旗开展工作，发展两名党员，并成立内人党杜尔伯特旗支部。1946年1月，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葛根庙（乌兰浩特）召开，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旗派代表参加。2月，色旺多尔济迁回巴彦查干，准备另立政府，接受东蒙古自治政府领导。旗、县合并前的泰康县建置区被以傅振绪为首的地方治安维持会和地主武装所控制。

2、中共旗工委及杜尔伯特旗人民政权建立

1946年3月，色旺多尔济向各保发出通知，决定于4月7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自治政府。4月1日，中共嫩江省工委派胡锡光、武衡、程正杰等人组成中共杜尔伯特旗工委，胡锡光任书记，率工作队从泰来过江进入杜尔伯特旗开展工作。色旺多尔济对胡锡光、武衡等的到来表示欢迎。4月7日，旗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胡锡光、武衡列席会议并讲话，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会通过成立杜尔伯特旗自治政府的决议，选举色旺多尔济为旗长，冠布仁钦为秘书科长，图布仓为保安大队长。并任命各努图克（相当区、保）的努图克达。自治政府设秘书科、总务科、内防科。同月，旗工委进入原泰康县辖区的泰和村建立党组织、村级政权和人民武装。5月20日，秘密发展党员4人，并成立支部，建立泰和区人民政府，组建一支30余人的联防队。此时，东蒙古自治政府已宣布撤销，色旺多尔济迫于形势而又受到党的民族政策感召，同意共产党参政，武衡就任副旗长。旗工委一方面着手改编旗保安大队，使之成为人民武装；一方面举办青年培训班，培养革命力量。改编后的旗大队以胡锡光为政委，程正杰为大队长，图布仓为副大队长。青年培训班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图布仓和色旺多尔济之子包维新都参加学习。包维新向旗工委提出入党申请，后被吸收入党。

3 泰康县人民政权建立

1946年3月，林甸县解放，傅振绪派人到林甸找嫩江军区一旅政委、中共第一专署书记吴富善，提出“和平解放泰康”和“欢迎八路军进驻泰康”的建议。3月28日，嫩江军区一旅一团政委高炳龙率骑兵四连进驻泰康。4月1日，嫩江省第一专署派张革（非党）从林甸带10余人到达泰康，接收地方治安维持会。4月3日，正式宣布解散维持会，成立泰康县民主政府，张革任代理县长。同时着手组建参议会，开办民事调解处。政府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公安局。将邮政局、电报电话局列为县政府指导机构。4月18日，泰康县选举参议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与会代表58人，代表工、商、农、教育、宗教、少数民族等各界各阶层。大会选出参议员15人，县政府指派参议员2人。4月19日，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县长通过案、全县维持治安案、军用粮草经费合理负担案、设置军警给养支应机关案、教育复兴案、民事调解处置案。